

中国城镇化促进会 研究报告

2021 年第 11 期（总第 90 期）

2021 年 9 月 17 日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及启示

张一帜¹

导言

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是在 20 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兴起的一场由知识分子引领、社会各界参与的救济乡村及社会改良运动，旨在维护现存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前提下，采用和平的方法，通过兴办教育、改良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地方自治与自卫、

报：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城镇化工作暨城乡融合发展工作部际联席会议成员单位；本会主席、副主席。

发：；理事；会员；分支机构；《新型城镇化》杂志社。

¹ 张一帜：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实习生。

建立公共卫生保健制度以及移风易俗等措施，复兴日益衰落的农村，实现“民族再造”或“民族自救”。本世纪初以来，中国政府推行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战略，民间也兴起了以复兴中国乡村为目的的乡村建设运动。在此背景下，学者们开始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衰落，各种天灾人祸使得农村到了崩溃的边缘。大多数学者认为农村衰败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

本文认为，虽然农村衰败是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重要背景，但从逻辑上来说，农村衰败并不必然引发乡村建设运动。而以下因素与乡村衰落背景的结合，才导致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产生。这些因素包括：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相关案例对国民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当时知识分子关注点由文化转向乡村、大量在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的积极参与，以及民国政府因势利导、积极推动民间乡村建设运动。分析研究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及其背景，对于中国当前乡村振兴战略及乡村建设运动有一定的启迪意义。

一、民国乡村建设运动概况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民国乡村建设运动风起云涌。根据南京国民政府实业部的调查，高潮时期，全国从事乡村工作的团体有600多个，先后设立的各种实（试）验区有1000多处。因参与主体比较复杂，决定了乡建模式的多样性，其主流派是由

教育和学术团体、大中专院校、民众教育馆等组成，其他参与主体有地方实力派人物、教会组织、慈善机构及国民政府相关部门等。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代表人物及其思想理念，最系统、影响最大的是“乡建三杰”晏阳初、梁漱溟和卢作孚。

晏阳初和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在河北定县的实验，被称为定县模式。晏阳初和他的“博士团”（大多是有海外留学背景的）在定县认真进行社会调查，诊断出当时中国农村普遍存在的“愚、贫、弱、私”四大病症，然后采用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三大方式，来推行“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同时推广合作组织，创建实验农场，传授农业科技，改良动植物品种，创办手工业和其他副业，建立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开展了农民戏剧、诗歌民谣演唱等文艺活动。

梁漱溟及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在山东邹平县的实验，被称为邹平模式，邹平一度成为全国乡村建设的中心之一。其办法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文明和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卢作孚在重庆北碚实验被称为北碚模式，走的是实业救国的路子，他以民生公司为后盾，从1920年代开始一直延续到1949年，在重庆北碚开展乡村建设实验：带领村民修建铁路、治理河滩、疏浚河道、开发矿业、兴建工厂、建设电站、开通邮电、建

立农场、发展贸易、组织科技服务等，又重视文化、教育、卫生、城乡形象的建设，使北碚在短短的 20 余年时间，从一个穷乡僻壤变成一个现代城镇的雏形。

二、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背景因素

（一）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和相关案例的长期根深蒂固的影响

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农耕文明历史的传统农业国家，乡村是华夏文明的源头，中国发展的历史就是一部中国乡村的变革史。有一种说法：治也乡村，乱也乡村；兴也乡村，衰也乡村。同时，乡村作为中国社会的基石和根脉，自古就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回望历史，无论是老子的“修之于乡，其德乃长”，还是孔子的“吾观于乡，王道易易”，以及孟子的“乡里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都可谓是中国古代圣贤对理想乡村的诠释。而北宋时期（公元 1076 年）吕大钧制定的《吕氏乡约》（后期经南宋朱熹和明代吕坤增补发展）和明代（公元 1518 年）王阳明颁布的《南赣乡约》更是从乡民合作、道德约束和社会教化等方面，把中国传统的乡村建设推到了一个新的历史高度。明代发展的以乡约为核心的乡村治理系统，可惜到了清代就中断了。中国近代第一个农业社会学博士杨开道曾大胆地猜想，假使没有清兵入关和农民起义，“假以时日，整个乡治或者可以立定基础，成为中国民治张本”。

19 世纪世纪末、20 世纪初，清朝甲午战败后，张謇对政治

失望，辞官回到南通兴办实业、建设家乡，被称为“村落主义”，其源头是汉末田畴率领族人和附从者建立和经营的“无终山都邑”。张謇以理想主义精神的社会实践，把源于“无终山都邑”的桃花源式理想社会与近代教育、城乡建设、实业、市场、资本、治理等实践融为一体，是深受古人的思想和案例影响，又进一步启发了后续的乡村建设运动。定县翟城村米氏父子的乡村治理实验（直接引发了晏阳初的定县实验）及梁漱溟的邹平实验，更是直接以《吕氏乡约》为蓝本发展起来的。梁漱溟为自己一生确立的使命，是“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复兴衰落的儒家文化。

（二）知识分子关注点由文化转向乡村

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国面临“三千余年一大变局”。西方工业文明和城市文明进入中国，传统的中华农耕文明遭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传统农业社会的经济基础、政治思想、知识结构、学术思想和道德信仰都发生大规模的改变，中国逐渐进入了近代化过程，在经济、政治和文化领域全面学习西方，努力寻找富国强民的良方。

1910年代时人倡导的新文化运动，主流是批判旧传统、创造新文明，也对“倒洗澡水倒掉孩子”的情况进行反思，强调要从“破坏者”转变为“建设者”。1920年代，知识界关注议题从文化议题集中转向乡村议题，反映了时代思潮的转向。例如，被誉为“最后的儒家”的学者梁漱溟在1921年出版《东西文化

及其哲学》一书。在比较中西文明后，梁漱溟明确提出民族自救的基础在乡村，“原来中国社会是以乡村为基础，并以乡村为主体的；所有文化，多半是从乡村而来，为乡村而设”。此后梁漱溟从文化哲学研究走向乡村建设。北京大学教授李大钊一直关注东西文明比较，1919年，李大钊认识到，“要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号召青年到农村去，“拿出当年俄罗斯青年在俄罗斯农村宣传运动的精神，来作些开发农村的事”。钱智修是报人代表，1920年就任《东方杂志》主编后，发表了《本志之希望》一文，明确表示，“今后所陈情于社会者，尤当注意于切实可行之具体问题”。此后相继发表《都市集中和农村改造》等文章，《东方杂志》通过征文、约稿、来稿、转载等多种方式聚焦于乡村，使得中国乡村问题得到社会大众重视。1930年代，知识精英的视角重心由农业问题、农民问题进一步转向综合性的乡村问题，关注点扩展至农村经济、农村人口、农村组织、农村教育等方面。与此同时，朝野上下对乡村问题的关注达到空前的高度，农村问题的严峻性被广泛认知。《中国农村》《农村合作》《乡村建设》等专门讨论乡村问题的期刊纷纷创办，甚至综合性和商业性的报刊也重点关注乡村问题。在此背景下，民国乡村建设运动于1930年代达到高潮似乎顺理成章。

（三）大量在海外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和西方学者的积极参与

近代中国社会对乡村的关注深受西方影响，往往以国际视角观察中国情景，源于大量关注者具有西方留学背景以及关心中国的西方学者的积极参与。学成归国的知识分子中留学美国和日本者居多。如留学美国的过探先、杨开道等，留学日本的吴觉农、陈锡鑫等。杨开道于 1927 年在美国密执安农工学院获得农村社会学博士学位后回国，先后撰写了《农村社会学》《社会研究法》《新村建设》《农业教育》《农村问题》《中国乡约制度》等著作。同时，西方学者的影响也很重要。如创办近代中国农林学科（金陵大学农林学院）的美国农业专家芮思娄（J. H. Reisner）、来华任教的卜凯（John L. Buck）、应邀来华调研的白斐德（Lenyon L. Butterfield）等，日本学者田中忠夫、那须浩等。同时，时人还大量翻译出版西方农业理论书籍和论文，介绍合作理论、农业经济学、农村社会学等，并初步运用这些理论来阐释中国的乡村问题。

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的主要领导人，大多具有西方留学背景。干事长晏阳初，是耶鲁大学政治学学士和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硕士；秘书长兼公民教育部主任陈筑先，留学日本和美国 8 年，主修政治经济及哲学；总务主任瞿菊农，是哈佛大学教育学博士；戏剧教育部主任熊佛西，是哈佛大学博士；乡村工艺部主任刘拓，是爱阿华大学博士，等等。

正是这些有情怀、有学识、有国际视野的知识分子的积极投入，以科学方法开展社会调查和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影响了中国

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且对当代世界农村发展管理理念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在国内外享有盛誉。

（四）民国政府因势利导、积极参与和推动

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1928年10月，国民政府宣告进入训政时期，重点是保持社会安定和推行实业建设，主要内容是政治建设、经济建设和教育建设。1931年，国民政府邀请晏阳初、梁漱溟至南京，商讨乡村建设问题，同时委派内政部官员分别到定县、邹平考察，并于1932年12月召开第二次全国内政会议，通过了《县政改革案》。1933年7月，经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中华职业教育社、江苏省立教育学院的大力促成，在山东邹平成立了“乡村工作讨论会”，并连续召开过4次全国会议，到会的一百多个团体和机构，集中了当年乡村建设运动中最活跃、最有思想和纲领、最有成就者。国民政府官员积极参与“乡村工作讨论会”，在工作研讨过程中把政府的主导意识带给了全国乡建团体，进而影响全国乡村建设运动。1934年，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李宗黄带领7名成员的考察团，历时34天，考察了江宁、邹平、青岛、定县的乡村建设实验。国民党中央还邀请晏阳初、梁漱溟参加国民党的内政会议，并分别委任为河北省和山东省地方自治指导员。

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与国民党各级政府合作，共同推进乡村建设运动。鉴于乡建工作的复杂性和综合性，实践证明，如果没

有官方支持，仅凭民间团体的力量推进乡村建设，举步维艰、困难重重。民间团体经过前期摸索，逐渐放弃了以纯教育或学术的身份推行乡村建设的立场，而提出了“政教合一”的口号。梁漱溟指出，所谓政教合一，“其内容就是：办社会教育的机关，借政府力量施行他的社会教育；而政府则借社会教育工夫，推行他的政令”。政府通过考察，对乡村建设运动的性质及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也表示出与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合作的愿望。其结果便有全国五大县政建设实验县（定县、邹平被列入其中）的设立，一些没有成为县政建设实验县的实验区，其从事乡村建设的团体也与当地政府实现了形式不一的合作。

三、结语

通过以上背景分析，可以更加深入理解民国乡村建设运动。其创造的知识分子深入农村理念、平民教育理念、农民合作理念、群众参与理念，以及公平土地制度、推广农业技术、发展家庭副业、建设乡村公共设施、改善农村教育和医疗条件等方面的探索，不仅影响了中国乡村经济社会的变迁，而且对当代世界农村发展管理理念和社会实践产生了不可低估的贡献。当今，国家大力推行乡村振兴战略，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的理念和方法，值得研究和借鉴。

参考文献：

1. 郑大华：《民国乡村建设运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0 年版。

2. 温铁军、潘家恩：《中国乡村建设百年图录》，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8 年版。

3. 《民国研究》2018 年秋季号。南京大学人文基金资助集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4. 温铁军等：《乡建笔记》，东方出版社 2020 年版。

5. 半汤乡学院：《旅游，重塑乡村——安徽“三瓜公社”美丽乡村建设实践探索》，中国旅游出版社 2018 年版。

7. 韩俊：《调查中国农村》，中国发展出版社 2009 年版。

8. 吕思勉：《中国通史》，吉林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

9. 宋恩荣：《晏阳初全集》，天津教育出版社 2013 年版。

10. 梁漱溟：《梁漱溟全集》，山东人民出版社 2005 年版。

编制：中国城镇化促进会研究部